

1994年，水北阁被整体迁移重建于天一阁南园，后来作为“中国地方志珍藏馆”的藏书、研究工作场所。

时光荏苒，现任中国地方志珍藏馆副馆长的龚烈沸，已坐拥水北阁16年之久。今年8月，其著述《徐时栋年谱》出版，他以此向先贤致敬并表达感恩之心。

徐时栋是宁波文化史上一个非常有分量的人物，集藏书家、朴学家、书法家、诗人、教育名师于一身。可是，后人对他的认识还远远不够。《徐时栋年谱》的出版，无疑对徐时栋的生平和各方面的成就作了一个全景式的展示，从而让宁波人了解徐时栋所处的时代和他对于宁波文化的意义。

1864年6月，月湖书生徐时栋在城西草堂旧址重建新宅。因为此前的“烟屿楼”“城西草堂”藏书都毁于火灾，“烟”“草”惹火，实在是一大忌，所以这次他把新书楼命名为“水北阁”。(藏书楼在一水池之北，以“水”命名，也是为了防止再度遭劫。)

编写陈列大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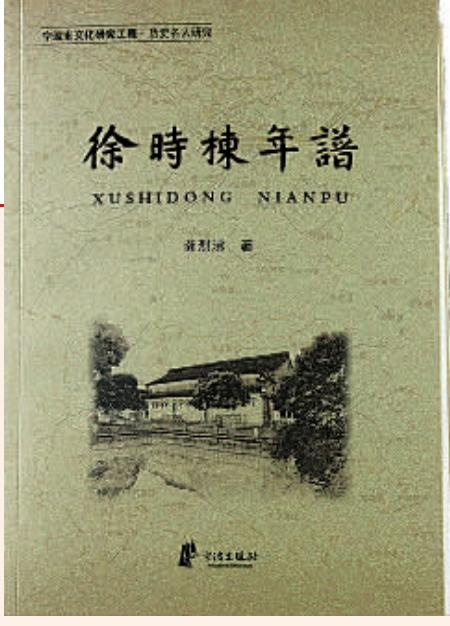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与先贤灵魂对话

龚烈沸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，宁波师专毕业后报名支援海岛，被分配到普陀山。因为经常要给学生和朋友讲解普陀山的景点和人文掌故，他便开始接触普陀山志等地情书，还与人合作编著了《海天佛国普陀山》《普陀山诗选》。这大概是她参与地方文化研究的发轫之作。后来，他调到余姚，专门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。他是一位才子型的作家，有不少散文、随笔、诗歌、小说见诸报刊，调入天一阁工作后，他的精力投入到新编地方志的收藏、保护中。方志馆日常工作之余，他也参与新方志的编纂、评审，旧方志的点校注释和地方文化的研究上。迄今已经独立完成著述(撰著、编著、点校、选辑、辑注)15部，与人合作的就更多了。可以说，他的这些著作中，《徐时栋年谱》是编得最苦最累也“最有温度”的一部。

2014年是徐时栋诞辰200周年，水北阁建成150周年，迁至天一阁南园复建20周年。天一阁特地举办“月湖书生——徐时栋诞辰200周年纪念展”。编写陈列大纲，掌管地方志珍藏馆的他当然义不容辞。为此他细细研读了徐时栋的著作《烟屿楼诗集》《游杭合集》《烟屿楼文集》《烟屿楼笔记》《烟屿楼读书志》《徐柳泉手抄诗稿》等10多部，看遍了天一阁馆藏徐时栋藏书及题跋、书法、手迹、碑帖和藏书印。

在编写陈列大纲的过程中，一次次修改、提炼，他似乎一次次和先贤对话。徐时栋，原字云生，后改字定宇，又字同书，号澹斋、柳泉等，清末鄞县城区(今宁波市海曙区)人。徐时栋生长在一个不适合读书和著书立说的时代。鸦片战争、辛酉政变、太平天国起事等，使他饱受战乱之苦。徐时栋命运多舛，16岁丧父，37岁丧母，33岁、47岁两次丧妻，又曾四次殇子。他十岁开始藏书，一生嗜书如命。藏书曾经三毁四聚。他的烟屿楼藏书(含恋湖书楼原藏书)“将十万卷”，城西草堂“五六万卷”。太平军攻入宁波时，他的藏书受到损失；继之为避寇，将书藏在城岙山的金岩寺山洞里，竟被寺庙的僧人焚烧取暖。后在城西草堂，一次意外失火又使他的藏书化为灰烬。可是，这种巨大的损失没有摧毁他，他仍然执着地藏书、读书。徐时栋去世后，到了宣统三年，水北阁藏书全部出售给了上海的书商。书商在上海售卖时，一些被宁波藏家买了回来，大部分则散失在不同的藏家手中。所幸宁波各藏家的藏书，均先后捐赠给天一阁，其中就有徐时栋的旧藏。今天天一阁藏徐时栋著述与藏书近100种1000余卷，刻本抄本兼有，批点、题跋众多，朱墨两色分明。

徐时栋既是藏书家，又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。“平生有愿如此水，会当读尽琅嬛书”，他每天晨夕勤读，手不释卷。书中密密麻麻均是题跋。就拿他读清人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为例，53岁、56岁两次购置，自同治四年至十年，研读长达7年，批点多达380余处，不少还是在病中、舟中读评。他秉承了万斯同、全祖望的治学风范，更难为可贵是他跋涉穿行于宁波文化的低谷时期。他致力搜罗乡帮文献，长于考据，驾轻就熟，是位杰出的方志家和谱牒家。他校勘刊印了《宋元四明六志》，为历代四明六志作者30人作单传或合传15篇，撰写《宋元四明六志校勘

徐时栋画像
(林绍灵绘)徐时栋年谱
(周楚翔摄)

记》9卷。以他为统领，好友董沛、陈勤、张恕，弟子刘凤章、陈康祺、孙德祖等人组成了高水准的同治《鄞县志》编修团队，先后在水北阁和甬上卢氏抱经楼、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抄写有关鄞志资料。他因终日修纂，积劳成疾，60岁就驾鹤西去。其文品、人品在甬上文化史中是令人崇敬和缅怀的。

徐时栋的才能是多样的，其诗歌，颇有白居易风格，平实易懂。尤其是鸦片战争时期的诗作，《八月湖水平》《鬼头谣》《乞儿曲》《临高台》等，记录风云诡谲下的民生疾苦，以诗证史，皆有助于浙东鸦片战争史、抗英斗争史的研究。他又是位颇有造诣的书画金石收藏家和篆刻家。曾自云“我作草书以意造，快如蚕食转如环”。1933年，鲁迅购置《烟屿楼笔录》，读到他所书清人何瓦琴对联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，非常欣赏，还书赠瞿秋白。他又是一代名师，被四明人士“推为儒宗”。弟子中不乏继承其衣钵者，对弟子他不论出身贵贱，一视同仁，勉励有加。

编写陈列大纲，龚烈沸以诗文著述为主，勾勒徐时栋的生平行状，提炼其藏书精神。展览通过“命运多舛，见证风云”“三殿四聚，痴迷藏书”“藏以致用，著述等身”“直抒胸臆，诗书作史”“提携后学，造就人才”五个篇章，力求全面还原这位“月湖书生”的形象。展出的有馆藏古籍40余册，碑帖10余件，书画作品10余件以及徐时栋的藏书楼——烟屿楼、水北阁等珍贵照片资料。2015年10月3日，此陈列简化精炼后移入徐时栋最后一座藏书楼水北阁作固定陈列。

可是，陈列毕竟只是吉光片羽，无法呈现徐时栋孜孜以求，等身著述之原貌。而且有那么多摘记资料在手，只有深化研究，才能物尽其用。“就像一条大黄鱼，把鱼唇拿走了，但还留下鱼身子，我力图做一道完整的‘鱼菜’。”龚烈沸风趣地说。他决意编《徐时栋年谱》，是因为心目中对先贤的崇敬，也是对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人的交代。

编写年谱

——追寻书生足迹

为了编《徐时栋年谱》，龚烈沸查考《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》，只查到宁波人俊著有《徐柳泉先生年谱》2卷，“稿本(待坊)，作者自藏”。干人俊对浙江方志编

情系乡贤徐时栋 甘坐多年冷板凳

——记龚烈沸和他的《徐时栋年谱》

赵淑萍

龚烈沸近影
(夏健航摄)

纂多有贡献，但出于种种原因，著作并未面世。1982年先生作古，考证再三，还是未能发现其著《徐柳泉先生年谱》付印，那么，这稿本还存世吗？这个问题只有时间去回答了。

此前，学人们诧异，嗜书如命的徐时栋，为什么将书藏于两地两处两楼——城中的烟屿楼、城西门外的城西草堂(火灾后再建的水北阁)，而未归储于一地一处一楼呢，这对阅读、校勘带来诸多不便。深入研究徐时栋后，龚烈沸得出了自己的判断。因为烟屿楼原名恋湖书楼，是徐时栋父亲徐桂林传下来的，徐时栋20岁时“析箸”分家，其父已卒。徐时栋和二弟以及年幼的六弟一起居住。烟屿楼的藏书是父亲徐桂林留下的，所以是大家共同的遗产。他不能将书搬迁到城西草堂(水北阁)，只是，徐氏其他兄弟在世时对书兴趣不大，烟屿楼的藏书基本上是徐时栋一人在关注。

细读《烟屿楼诗集》，龚烈沸时时有新发现，有小惊喜。原来，徐时栋和天一阁楼下补写全祖望对联(全祖望原迹散失)的陈勤，陈氏宗祠之麻将闻人陈鱼门兄弟、状元厅主人章鋆，司马第所挂“夜雨闲吟左司句，时晴快傍右军书”楹联书写者冯登府都曾有诗文往来。他们以文会友，以书会友，而且百年后又在天一阁“英魂重聚”，这不能不说这是宁波文化史上的一个佳话。读徐时栋《八月湖水平》，龚烈沸还发现了新版《鄞县志》上一个小小的错误。鸦片战争英军入侵，宁波文武官皆逃，而徐时栋家人亲见一知县秉持气节，投水自尽，徐把这写入诗中。而新版《鄞县志》上把这位知县的名字记错了。随之，他撰文给《浙江方志》，以存其真。2015年，他和同事一起到鄞江镇大桥村锡山之黄森，登访徐时栋父亲徐太茂(桂林)先生墓。因梅园山庄建设，列入鄞县文保点的徐太茂墓道等遭到破坏，墓已经经敲破从生……在当年的徐时栋研讨会上说起这种迹象，他痛心疾首。他也曾专访徐时栋姻亲地、避难处，所撰碑文碑碣现存地、墓地——鄞江慈恩、三七市叶家、建岙锡山、龙观乡凤凰山等，一一加以探寻确认。

在《徐时栋年谱》中，龚烈沸梳理了现存的《月湖徐氏家乘》《大墩徐氏宗谱》《游杭合集》《烟屿楼集》《徐振王志》等徐氏著作，还对全国图书馆馆藏徐时栋稿本、抄本、藏书题跋、碑帖、藏书印等进行了广泛搜集整理。同时对徐时栋好友如陈勤、董沛等诗文中有关徐时栋的记

致力地方文化传播

——秉承学人精神

跨入天一阁的西大门后，向天井中面容清癯目光深沉的范软老先生像行个注目礼，然后从右边的八角门进去。曲径通幽，在花香竹影中行走，在一扇旧式的镂空的木雕小门前打住，推进去，狭小的天井里花草葱郁，这是水北阁。在那散发着书香的木屋里，龚烈沸坐了16年。

笔者去采访的时候，龚烈沸的案头，放着余秋雨先生近日寄来的“天一阁湖景区”题词，横竖各一幅。记得，5年前，龚烈沸出了一本《话说天一阁》，也是余秋雨先生题的词。在那本书里，龚烈沸轻松地说着大白话，连天一阁里的两棵硕大的含笑树、那枝蜡黄蜡黄的腊梅、两棵常有桂子悬挂的桂花树都作为引路标记之宝了。每一块匾额，每一副楹联，它们的含义，它们的作者，作者们的生平事迹，他都了如指掌。每一处建筑，这建筑的前世今生，是原有的，还是别处迁入的或是近年来扩充的，他都熟稔于心。天一阁的辉煌和沧桑，范软、范大冲以及几位贡献突出的范氏后人，历代名人与天一阁，天一阁之外的宁波的藏书楼、有关天一阁的著述……虽说是大白话，文字浅，可立意不浅，在说话时，有自己的视角，自己的观感，有一种淡而雅的抒情气息，有一种幽默的趣味。他潜心地做了这本书，是为了回报天一阁对他心灵的滋养和提升。随后，在同事们的配合支持下，他索性对天一阁联作了一次彻底的普查，又出了本《书城木石香——天一阁博物馆匾联释读》。

不仅仅是他自己工作的天一阁，他对宁波文化的研究，延伸到方方面面。2012年，他接受宁波市中医院的委托，编成《宁波中医药文化志》一书。这是首部宁波中医药文化志，上限溯至河姆渡文化，下限截至2010年，以志为主体，记、志、传、简介、文献选载、图照并用。全面系统地著录了源远流长的宁波历代中医事略，充分彰显了丰厚的宁波中医药文化，丰富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宁波的文化内涵。既有较强的资料性，又有较好的可读性。此书与张如安《宁波中医药文化史》同时发行，时任宁波市副市长的成岳冲评价说：“两书的编著出版，既是宁波卫生界的一件大事，又是宁波文化界与宁波卫生界携手合作的一项重要成果。”

他还对宁波地方史志和地方文献上吟咏宁波“下饭”的诗词感兴趣。每每读这些诗，便觉得唇齿留香。“其享受不亚于‘饕餮’者的大快朵颐，于是利用零星时间，一一抄录在案”。念及宁波餐饮业的日益发达，宁波餐饮和餐饮文化研究方兴未艾，加上亲朋好友的“怂恿”和鼓励，他便萌生了辑注出版一本《舌尖风雅——宁波下饭诗500首》的念头。很快，他便付诸行动。为使读者对宁波“下饭”有一个清晰的了解，他尽可能给诗所咏的“下饭”配上图片。在文化的传播方面他做得细致而又深入，举凡宗谱族谱续修、乡下山野文化遗迹考证、民宿餐饮策划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、重大事件碑文撰写，乃至红白婚丧等等，他都乐于用自己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和些许能力参与其中，几乎可以说不遗余力。

地方史志和地方文化的研究是极其艰苦的基础性学术研究活动。但是，龚烈沸却并不艰辛，甘于坐冷板凳。也许，在月湖畔，在那一缕缕书香的浸润中，他的灵魂时常和几百年前的先贤对话。追寻书生的足迹，秉承学人的精神，他愿意像他们那样，给宁波的文化史留下一些东西。

